

清代中後期學者的課子經驗與效果： 以錢儀吉、錢泰吉為中心

The Experi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Elite Families' Education for Children
in the Middle and Late Qing Dynasties: Focusing on Qian Yiji and Qian Taiji

瞿 艷丹 (Yandan Qu)*

ABSTRAC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chievement and official positions could not be inherited, and as a result, family status was constantly at risk of downward mobility. For intellectual families whose ancestors had already obtained title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were undoubtedly the most regular path. Educating their descendants to study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maintain the family's social status. This paper focusses on the families of Qian Yiji (錢儀吉) and Qian Taiji (錢泰吉) as case studies to explore their respective experiences in teaching their children and the corresponding effects.

KEYWORDS: 錢儀吉, 錢泰吉, 課子, 科舉

一、引言

中國傳統社會的流動性問題素來吸引了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展開研究，特別是明清以降科舉起到的重要作用。何炳棣指出，明初科舉促進了寒素之士向上的社會流動，但清代中後期寒素之士成功向上社會流動的實質機率大幅降低，高地位家庭可能因未給子女適當教育、沒有新的科舉成功等因素導致長期向下流動¹。艾爾曼 (Benjamin Elman) 則認為，科舉制度的影響不僅在於社會流動和社會結構，而是廣泛地影響了中國人的心態和精神狀況。伍躍著眼於明清時代的捐納制度，認為來自社會、尤其是來自社會下層的要求上升的動力，促使人們選擇和利用了捐納這種國家制度，在一定時期內維護了社會的相對穩定；但當這種選擇和利用超出制度的容納限度，國家政權又無力進行改革時，制度本身的作用便會趨於衰減，甚至導致國家政權

¹ 何炳棣著，徐泓譯注《明清社會史論》，聯經出版公司，2013年，頁203，頁324-326。

* Part-time Lecturer of History of Modern Asia,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Kindai University.
Email: quliuqing@gmail.com

的瓦解²。這些研究提出的觀點都深具魅力，引發了諸多新的探討。本文目的不在於修正以上結論，而是試圖從受科舉制度直接影響的當事者角度出發，提出這樣的問題：在功名和官職無法世襲的社會制度之下，家庭地位時刻面臨向下流動的危機，家長會有怎樣的行動與應對方式？對於祖上已有功名的知識家庭來說，科舉無疑是最正統的路徑，教育兒孫習舉業就成了希冀家族社會地位不墮的至為關鍵的事業。由於清代不同時期、地域的情況都有很大不同，很難就知識人如何教育兒孫科舉應試的整體情況作出清晰的結論；與之相對，個案研究就顯出特別的價值和魅力³。本文重點關注乾嘉至道咸時期的情況，即歷來被視為由盛轉衰的清代中後期，聚焦錢儀吉（1783-1850）、錢泰吉（1791-1863）這兩位出身嘉興望族的學者，討論他們教育子孫的經驗及子孫的科名情況，同時考慮婚姻關係與家族社會地位升降之關係。

錢儀吉、錢泰吉為從兄弟，同入《清史·文苑傳》，有「嘉興二石」之稱。曾祖父錢陳羣（1686-1774）曾三次遇康熙南巡獻詩，極得恩寵，是錢氏家族地位最崇高者。祖父錢汝恭（1727-1774）為陳羣次子，乾隆十二年（1747）舉順天鄉試，二十二年秋以大挑知縣分發江南，二十三年署高淳知縣，二十四年充江南鄉試同考官，後歷任江寧、新鄉知縣，官終安慶府同知⁴。錢儀吉父錢福胙（1763-1802）為汝恭第四子，乾隆庚戌（1790）進士，嘉慶七年三月卒於故鄉。錢泰吉父錢復（1754-1806）為汝恭第二子，出嗣錢陳羣第三子汝慤（1729-1746）。錢復乾隆四十一年（1776）援川運例得府經歷，分發福建，借候補官縣大湖丞，署建安、羅源、閩清、甌寧等縣知縣，五十七年（1792）改官直隸，補雄縣丞。嘉慶元年（1796）擢吳橋縣知縣，四年（1799）擢大興縣知縣，十年冬卒於京師。嘉慶六年，錢儀吉舉鄉試，考中浙江省第二十二名舉人。嘉慶十三年（1808）會試中式，殿試二甲第二十二名，選庶吉士，從此開始了十餘年京官生涯與後半生漂泊異鄉之旅。而泰吉雖在十八歲時以經義古學第一入縣學，後歲試又第一，卻屢困場屋，道光元年（1821）以訓導候選，道光七年選授杭州海寧州學訓導，此後在海昌縣學潛心學問。儀吉、泰吉雖身處不同環境，但都以維繫錢氏家族文脈延續為自己的重大職責，而其首要問題就是教育子孫讀書習舉業。那麼，他們進行了怎樣的實踐，教育結果又是如何？本文接下來將具體討論這些問題。

二、京官時期錢儀吉的課子經驗

錢儀吉出生時，曾祖、祖父俱已謝世。四歲時，父親錢福胙剛中舉，考充咸安宮

² 伍躍〈明清中國社會成員的制度選擇——以捐納制度為中心〉，《明代研究》第26期，2016年6月，頁1-41。

³ 比如沈艾娣在《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人生》（趙妍傑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中生動再現了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初，山西鄉村讀書人劉大鵬在變動時代中沉浮的一生，除了劉大鵬自己的應試經歷，第三章〈孝子〉也講到劉大鵬之子的求學過程。

⁴ 天津圖書館藏《文端公年譜》卷之下，光緒二十年刊本，葉11b, 13b, 15b, 19b, 52a。

教習，辭家北行。此時錢家老屋質他姓，經濟極困，儀吉與同胞姊錢慶韶跟隨母親戚芷生投奔袁花鎮外祖父戚朝桂，居外家長達八年（1786-1793）。儘管錢儀吉的敘述中從未提過這點，但有資料顯示錢福胙是入贅戚家，也可見此時名臣之後境遇之窘⁵。戚朝桂自乾隆三十一年（1766）由楚北罷官歸里，「積書七千餘卷，稍藝花竹，春秋觴詠」，悠閒自適。錢儀吉深受外祖父喜愛，下學後常在外祖父跟前講書複習⁶。多年後錢儀吉回顧這段溫馨的時光，「扶床日索鵝油餅，七歲兒隨孺人寢。母行省墓兒遷枕，宵為卷衣朝結社」，「外孫下學揖而走，呼問授書今至某。業在檀弓曾子篇，細論何其久」，舅家的撫養對他而言是無以回報的厚恩⁷。

乾隆五十八年（1793），錢福胙中進士後第三年，錢儀吉奉母入京，雖年尚幼稚，但已有機會與京中一流學者接觸，也表現出詩文學問方面很高的天賦，「徧讀《十三經》，熟精《文選》，背誦不遺一字」⁸。嘉慶四年（1799）隨侍擔任福建學政的父親南行，入閩學署。六年（1801）年夏歸里，是年舉鄉試；十二月，與幼年時即已定姻的餘杭陳爾士成婚。爾士生於富紳之家，父陳紹翔捐納出身，家境優裕，來歸時母親蔡氏與之金二千多，專為儀吉買書之用⁹。學政是欽差，在省里地位僅在將軍、督撫之下，地位尊貴，任滿回京後很可能被重用，此時錢福胙很有希望為錢氏家族帶來更多資源。但不幸的是，次年三月末，錢福胙竟突然病故，錢家再度陷入困境，錢儀吉應試的壓力無疑更大。在經歷了一次會試報罷（1805）後，嘉慶十三年（1808）年春闈，二十六歲的錢儀吉順利考中進士，選庶吉士，次年散館，改主事戶部江南司兼陝西司。錢儀吉會試中式的年齡遠早於張仲禮推算的太平天國前進士及平均年齡（36歲）¹⁰，並進入日後容易升遷高位的翰林院，已充分具備維繫錢氏家族的文脈及社會地位的基本條件。

嘉慶十五年（1810）春，陳爾士與錢儀吉胞姊錢慶韶，姊婿李培厚同侍戚太夫人入都，錢儀吉的側室，長子阿英（約1803年生，成年後名寶惠）應同行。此時陳爾士一子一女已早殤，次女頤壽生年雖不可考，但後來生於北京的可能性較高。《錢氏家譜》（1826）記載錢儀吉側室共四名：程氏（1787年生），嘉善胡氏（1791-1807），長洲胡氏（1791年生），姚氏（1797年生）¹¹。嘉善胡氏早亡，此番上京的側室只有三位。程氏是阿英生母，在諸妾中年最長，作為目前家庭中唯一存活的男孩的生母，想必地位也稍高。為了迎接北上的一家老幼，錢儀吉數度搬家，最終移居永光寺中

⁵ 許嘉猷編《許順庵老人自述年譜》，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道光間刻本，葉5a。

⁶ 錢儀吉〈戚府君家狀〉，《衍石齋記事稿》卷八，光緒六年重刊本，葉33a-36a。

⁷ 錢儀吉〈述舊三首上餘齋先生〉題記，《澄觀集》卷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鈔本，葉19b。

⁸ 蘇源生〈書先師錢星湖先生事〉，《碑傳集補》卷十，葉4b，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100輯，文海出版社，1973年，頁606。

⁹ 錢儀吉〈妻陳恭人述略〉，《衍石齋記事續稿》卷八，葉四十二a。

¹⁰ 張仲禮著、李榮昌譯《中國紳士：關於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頁133-134。

¹¹ 錢臻等重輯《錢氏家譜》卷八，道光六年刊本，葉16ab。

街，與錢慶韶一家居住相距二里，兩家往來十分密切。其時錢儀吉從子錢寶甫（1771-1827）也隨儀吉一家共住，直到嘉慶十七年，寶甫妻沈氏入都才搬出。

要提高子孫中式的概率，首先要確保有足夠多的男性學齡兒童。但錢儀吉的幼生兒女夭折率極高，鄉居時已有兩子夭折，分別是爾士所生衍徽、程氏所生衍淳（1806年殤）。京居時期最先夭折的是長洲胡氏所生朋壽，自嘉慶十九年（1819）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間，又相繼夭折四子四女兩孫。順利成人的只有長子阿英（寶惠）、次子阿荷（後名尊煌）、三子阿苞（後名寶宣）、幼子萇兒（後名彝甫），以及次女頤壽（遠苓）、三女慈壽（仲愉）、四女叔琬。除卻陳爾士去世後出生的苞、萇二子，其餘二子三女均受到陳爾士的悉心撫育與教養。和清代多數知識家庭一樣，母教是兒童早期教育的重要一環。陳爾士育兒課子之盡心盡職，在她的著作《聽松樓遺稿》裡有詳細記錄，素受論者稱許。

嘉慶十六年（1811），錢儀吉同族三兄錢械（1780-1835）至京師¹²。其時錢儀吉親自課讀寶惠，有事外出，則從子寶甫代課；偶爾錢械過來，也會幫忙。「嘗一日中三人更迭督視，兒亦不知孰為本師也」¹³。錢儀吉也為寶惠正式聘過幾位老師，首先是嘉慶十九年（1814）四月十四日，「訂沈孝廉敦齋僕課讀英兒」¹⁴。沈樸，秀水人，嘉慶十八年癸酉科舉人，儀吉從父錢載（1708-1793）長子錢世錫（1733-1795）門人¹⁵。寶甫為錢世錫獨子，與錢儀吉極相友善，沈樸很可能是經他介紹而來。此外，錢儀吉還曾請過當時京中很有名的考據學家臨海金鶚（1771-1819），不過金鶚不久病卒。至少就錢儀吉的經驗來看，在北京請到一位合適且長期教學的老師並不容易。首先是口音問題，當時科舉合格比例佔絕對優勢的江浙人都傾向聘請方言相通的同鄉學者，日後錢儀吉到開封教書，也曾感慨過北方口音不對，背書之不易¹⁶；其次，坐館教書往往是困於科場的讀書人不得已而選擇的謀生手段，京居不易，京中江南出身的師資流動十分頻繁。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家庭教育就顯得格外重要。

已有研究指出，自乾隆五十八年（1793）至 1898 年科舉改制方案頒行之前，鄉會試三場考試內容一直保持穩定，第一場考四書題三道，詩題一道，第二場考五經題五道，第三場考策五道。但清代科場風氣極重首場，第二、三場不受士子重視，導致首

¹² 錢械，錢綸光次子、錢陳羣弟錢峯曾孫，錢峯次子錢汝鼎孫，汝鼎次子錢淇次子，長兄錢希憲出嗣錢儀吉祖父錢汝恭長子錢豫章，故與儀吉、泰吉關係親厚甚於一般從兄弟。號雲壽，嘉慶三年（1798）浙江鄉試第二十三名舉人，嘉慶十六年（1811）西巡，召試欽賞緞疋。次年大挑二等，寧波府鎮海縣訓導。《錢氏家譜》卷八，葉 29a。

¹³ 錢儀吉〈子壽同居記〉，《衍石齋記事續稿》卷一，光緒六年重刊本，葉 18b-19a。

¹⁴ 任群整理《錢儀吉日記書札輯存》（外二種），鳳凰出版社，2022 年，頁 8。

¹⁵ 錢載七世祖錢與映第三子錢周為載曾高祖，與映第四子陞為錢陳羣曾祖，錢載與錢陳羣同屬錢與映支。

¹⁶ 「翟、杜二師，北方口音，背書亦不免費力。然未嘗不背也。但所背未必靠得住耳。」此間本地人，既極劣陋，且口音不對，即無以為啟發之地。」1839 年十月初二日錢儀吉致錢泰吉信，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鈔本。

場所考八股文章試帖詩成為士子備考的重中之重，由此簡化了士子群體的閱讀世界和知識世界¹⁷。但對於錢儀吉這樣出身文學世家、早已通過科舉選拔的知識精英來說，對自己兒孫的教育顯然不可能僅止於應試，必然會從最正統的經史之學入手。

嘉慶二十二年（1817）秋至次年夏，錢儀吉護送亡母靈柩南歸，陳爾士率兒女妾輩留守京寓，據錢儀吉定下的課程單嚴格教育寶惠，兼為其餘小兒女開蒙。其間錢儀吉從孫錢聚仁、同年摯友潘恭常都曾協助教授寶惠讀書作文。

那麼，錢儀吉制定了怎樣的課程單？由於沒有直接資料，只能依據陳爾士《聽松樓遺稿》卷三〈家書〉加以推定，在寶惠 15、6 歲時，每日功課主要集中在熟讀經書和學習作文兩方面。此時寶惠對《易》《書》《詩》《周官》《儀禮》《禮記》上半部、《爾雅》《四書》已有一定程度的熟悉，對《左傳》則尚生疏，於是每日重點在於熟讀《左傳》，同時複習其他較為熟稔的經書，兼背誦《周禮》。並藉由熟讀、背誦《國策》建立古文根柢。陳爾士在給錢儀吉的家書中事無巨細地匯報寶惠的功課情況，但《左傳》的閱讀進度卻不太理想，因此中途不得不回頭重讀。

由此可見，錢儀吉的課子方案與同時代文字學家安丘王筠（1784-1854）制定的《教童子法》旨趣相近：

蒙養之時，識字為先，不必遽讀書。……八九歲時，神智漸開，則四聲、虛實、韻部、雙聲疊韻，事事都須教，兼當教之屬對，且每日教一典故。才高者，全經及《國語》《國策》《文選》盡讀之。即才鈍，亦《五經》《周禮》《左傳》全讀之，《儀禮》《公》《穀》摘鈔讀之。才高者十六歲可以學文，鈍者二十歲不晚¹⁸。

乾嘉間經學家凌廷堪（1757-1809）乾隆六十年任寧國府學教授，為學生開列〈杞菊軒功課單〉，亦可反映清中葉的主流學術風氣，其中日課部分是：

每日早起讀生經文一百字，隨意溫熟文數篇。須用心探索，讀經不可間斷。

早飯後，溫熟經文二百字，隨意或臨帖，或鈔詩、古文，或札記、典故，或讀史數頁。

午飯後，隨意溫《四書》數頁。有暇，即參稽經史，討論詩文。

燈下，隨意溫熟文數篇，或抄舊讀詩文，或查考日間所讀詩文中故事。

五更醒後，默記新知，醞釀舊得，此最要緊，功效進益，多在此時。

對於尚未閱讀的經文，「皆陸續補讀，讀必精熟，務須手鈔。如不能百字，即數十字亦可」¹⁹。而寶惠讀《左傳》時也被要求鈔書。儘管比起錢儀吉十二歲時「徧讀《十三經》、熟精《文選》」的程度，寶惠顯然落後許多，天賦亦不見佳，但他所接受

¹⁷ 曹南屏〈清代科舉的知識規劃、考試實踐與士子群體的知識養成〉，《學術月刊》第 49 卷第 9 期，2017 年，頁 150-153。

¹⁸ 王筠《教童子法》，收入繆荃孫輯《雲自在龕叢書》第二集，天津圖書館藏光緒間刻本，葉 1ab。

¹⁹ 張其錦《凌次仲先生年譜》卷三，哈佛大學藏道光六年刻本，葉 3ab。

的顯然屬於乾嘉時期最正統的精英教育。由於錢儀吉次子尊煌比寶惠小十多歲，很長一段時間內，寶惠都受到了家中最多的關注和期待。送母靈柩南歸途中，錢儀吉寄給妻子的詩就很能說明這點，首句即抒發對長子的期望；至於還是嬰孩階段的次子，未來尚且遙遠，「阿英肯念此、保家望其賢。阿荷強葆中、孰測成敗端」²⁰。

為了讓寶惠有更好的讀書環境，錢儀吉將自己的書房借槐軒讓給他作書室²¹。嘉慶二十四年（1819）十一月，寶惠在錢儀吉陪同下南歸，至崑山與姑姑錢慶韶的女兒李介祉成婚，陳爾士在給寶惠的信中諄諄叮囑「所學不可荒廢」。此時次子尊煌始學認字，正讀《爾雅》釋言部分²²。道光元年（1821），寶惠、介祉長子枏孫出生。至道光四年，枏孫已初學作詩，與二叔尊煌、三叔寶宣一起讀書，錢儀吉對其讚許有加，期待他聰明超過寶惠²³。

道光六年（1826）元日，寶惠、介祉次子出生，錢儀吉大喜，取《左傳》「絳人年」的典故，祝福幼兒長壽，乳名曰絳、元絳（初名糖，後名瑤，字元之）²⁴。道光十年，錢儀吉幼子彝甫七歲，儀吉請從子錢濟授讀。錢濟（1795-?）譜名蘭孫，字洵芳，號循陔，海鹽縣學生員，錢爾復五世孫²⁵。錢爾復為明太常寺卿錢薇四世孫，錢陳羣從叔，著《半完圃詩稿》。錢濟雖無功名，但守護祖先錢爾復遺書甚勤，因此很得錢儀吉欣賞²⁶。自嘉慶二十四年（1819），錢儀吉伯父錢臻創議修輯家乘、以纂輯事專屬錢泰吉以來，泰吉即與儀吉在往來書信中詳述家族資料的搜集與考訂情形。錢儀吉素有整理家族文獻之願，對此傾注心力極多。他請血緣關係已很遠的同宗姪輩為幼子授課，背後自然有他對維繫廬江錢氏內部聯結、延續家族文脈的希冀。正如錢泰吉整理家族文獻之際，也屢屢感慨「吾儕不能支持門戶，惟是時思先人如何忠厚勤儉，如何力貧讀書，如何持躬式訓，以為久遠之計，思之述之，以傳示後之人，則我先人遺澤，尚可支持數百年乎」²⁷。

不過就在這一年十月中，錢儀吉因當時震動官場的戶部失察假照案降一級調用²⁸。同年十一月初，道光皇帝又諭令降調各員於補官後停其升轉²⁹，錢儀吉遂因之

²⁰ 錢儀吉《澄觀集》卷八，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鈔本，葉 2a。

²¹ 錢儀吉〈立夏借槐軒，予舊齋，今為英兒書室〉（1820），《定廬集》卷一，葉二 b。

²² 陳爾士〈家書〉第二十八通，《聽松樓遺稿》卷三，道光元年序刊本。

²³ 「雛孫四歲周三歲，目宇疎青頰映紅。見客愛將詩作問，入祠自詡拜能工。眼看程課隨諸叔，心冀聰明跨若翁。下學未妨仍劇戲，替攜竹馬鬧春風。」錢儀吉〈雛孫〉（1821），《定廬集》卷四，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鈔本，葉 13b。

²⁴ 錢儀吉〈元日丑時得孫名之曰絳，四詩志喜〉，《定廬集》卷五，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鈔本，葉 11b-12a。

²⁵ 《錢氏家譜》卷七，葉 23b。

²⁶ 「半完圃尚有遺書，賴子勤渠掃蠹魚，詩句吾宗傳筆舊，梅花山雪釀春初。弟無夏楚將逃學，翁返秦涼欲餽廬。生計日輸文日勝，天心自古一乘除。」錢儀吉〈六疊韻示從子循陔濟〉，《刻楮集》卷一，光緒六年重刊本，葉 6a。

²⁷ 錢泰吉《甘泉鄉人稿》卷二，同治十一年錢應溥重刊本，葉 12ab。

²⁸ 《清宣宗成皇帝實錄》卷一七九，道光十年十一月十四日。

罷官，生計益貧。道光十二年秋，錢儀吉攜家人歸里，寶惠一家留京師，李介祉鬻釵佐路費³⁰，尊煌仍依兄長未南還。此時寶惠三十歲，即將接近道光年間舉人中舉的平均年齡（31歲）³¹。他暫留京師，一是為料理餘事，更重要的還是為就近參加順天府鄉試。故鄉並無可以安頓錢儀吉一家老小的住房，加之經濟困窘，從小生活在京、正處應試年齡的寶惠還是留京備考最為穩妥。據當時制度，「順天鄉試，現任京外官胞兄弟子姪，隨任讀書者，准其取具本官隨任印文，無論正途、俊秀，一體收錄」³²。錢儀吉雖已去職，但族中尚有不少親屬居官在任，寶惠、尊煌留京應試在制度上並無問題。但自茲而始，京官時期錢儀吉為兒孫們提供的種種教育條件已不復存在，其餘幾位隨之南歸的兒輩也將踏上未知的漂泊之旅。

三、大梁時期錢儀吉的家庭教育實踐與效果

道光十二年冬，錢儀吉回到故鄉，借居大伯母金孝維家，暫作休整。錢泰吉自海昌歸，兄弟二人連日共讀，述先世遺聞軼事，向往日後同居耕讀的生活。此時錢儀吉已受兩廣總督盧坤之聘，將往廣州學海堂任教，並於次年四月下旬抵達。錢儀吉次女已嫁桐鄉沈寶禾，三女嫁德清戚士彥，同往嶺南的兒女應該只有四女、三子及幼子。

學海堂在粵秀山中，錢儀吉「與諸友商略經史，顧而樂之。課諸生為專經之業，定季課章程，頒日程，分句讀，評校著述，鈔錄四式，每課數十鉅冊，一一丹黃評覽，粵人之學益彬彬矣」³³。剛到粵不久，他便「課兒講《左傳》，蕭然自得」³⁴。他對故鄉姪輩的課業也益發關注，致泰吉信中必會關切姪輩讀書是否精進，自陳「老矣，所愛者養生家言，所望者子姪繼起」³⁵。

在粵期間，體弱多病的錢儀吉不習慣嶺南風土，遂於道光十五年（1835）夏與當初聘他來粵的盧坤告辭，計劃七月離開。許諾為他籌謀旅費的盧坤不久卻病亡，幸有廣東巡撫祁頊為他籌得千金，終於在九月二十日啟行。當時錢儀吉尚未確定接下來的去向，一度計劃去離家較近的江淮一帶書院謀職養家。同年老友周之琦（1782-1862）邀其往故鄉大梁書院執教，錢儀吉起先雖不願過去，但人才淵藪的江南一帶似乎很難求得教席，他終於在道光十五年冬定下去開封教書一事。

跟隨長兄在京的次子尊煌是年參加了順天鄉試，但並沒有成功，隨後回故鄉完婚。尊煌元配柞溪程韻，字均仲，是錢儀吉京官時代的舊交程同文之女，她的母親吳玖是程同文繼室，畫家，也是陳爾士的舊識。程同文、吳玖此時俱已謝世。儀吉三子

²⁹ 《清宣宗成皇帝實錄》卷一七九，道光十年十一月三日。

³⁰ 《庚子生春詩》卷下，道光二十年序刊本，葉4b。

³¹ 《中國紳士》，頁138。

³² 長秀等奉敕撰《欽定禮部則例》（道光二十四年）卷八十五「生監科舉鄉試」，葉5a。

³³ 蘇源生《書先師錢星湖先生事》。

³⁴ 1833年錢儀吉致錢泰吉信，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鈔本。

³⁵ 1834年錢儀吉致錢泰吉信，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鈔本。

寶宣將在次年赴京迎娶朱鴻之女柎曾，朱鴻是秀水人，翰林院編修，精於算學，也是儀吉京中摯友。這兩段婚姻應該在儀吉京官時代即已訂下，是合乎彼時儀吉身份地位的聯姻。

然而錢儀吉已無精力與盤費回鄉操辦次子婚事，便命寶惠在京措大錢三百千文，寄到泰吉處，拜託泰吉夫婦料理。恰好這年泰吉長子炳森也剛娶婦蒯氏，蒯氏祖母錢與齡是錢汝恭幼女，儀吉、泰吉姑母。比起婚事，錢儀吉更關注尊煌的功課，命尊煌婚禮之前都住在叔父處，請泰吉「務督其三、六、九按期作文，一期勿曠。因其渾身本事，只有幾篇爛墨卷，再一生疏，無可為也。至改文費心，吾弟斷不可用心，但令常做，則筆熟而有氣，可以望售。近來本無所謂題理題神也」³⁶。

道光十六年（1836），尊煌夫婦來到大梁。這一年，錢儀吉四女叔琬嫁史善載次子致昌為繼室，暫居北京³⁷。十八年，史致昌長兄致蕃出守福建福寧府知府，致昌全家亦相隨赴閩。致昌次年主講開封彝山書院，年末攜眷來到開封。這是離開北京後錢儀吉全家最為團聚之時，除了十九年病逝的次女，其餘諸子女都在身邊。二十年春，享受著久違的團圓的儀吉喜作《生春詩》三十首，子女媳孀孫輩齊奉和，刊成《庚子生春詩》上下兩卷。他在信中與泰吉傾訴此間心境：

兄率兒輩讀書，矻矻有年矣，自來大梁，家人散而重聚，妾婦輩亦相敬愛。大兒年長，於道理稍有所見。近年同讀遺書，講求先世文字事跡，亦間經史大義，我父子間實有安貧之樂，目中諸公袞袞，或未有此耳。五倫在門內者三事，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必有親而後有此父子，否則父不欲有是子，子且心非其父，何以為父子。必有別而後有此夫婦，否則夫不欲有其婦，婦則詬誶於其夫。必有序而後有此兄弟，否則不友不敬，於是兄弟夫婦之道失，而父子之道亦苦矣。治家之法，所當兢兢業業，朝夕不忘者惟此，所以讀書者亦為此。

儘管錢儀吉始終想要回故鄉，從未將開封視為終老之地，但大梁書院時期，他的生活相對安定平穩，讀書著述益勤，學術與思想亦趨於新境。他對書院學生的水平一向不太滿意，學生中能作詩者不過三數人，博覽詞藻自不及粵人，只有「士風整肅」還算難得。他也一針見血地指出，河南人才北宋以前極盛，如今漸衰，主要是因為士子不知何為讀書，而以時文弋獲科名為讀書，所以陷入讀書人益少、人才益不出的惡性循環³⁸。對此，他悉心傳授讀書之法：

教士各就所志而導之，或問性理，或談詩文，因材施教，不拘一格。頒日程，課讀經及語錄文字，旬日考定甲乙，隨課升降。又屬河道張公捐置經史諸籍，勵諸

³⁶ 1835年錢儀吉致錢泰吉信，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鈔本。

³⁷ 史致昌道光八年順天鄉試中舉，因道光九年、十二年兩科姊孀陸建瀛分校禮闈，依制迴避史致昌（王辰閏重九寄和莫毅農同年），《修筠閣詩草》卷一，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同治癸亥刊本，葉12a。

³⁸ 1840年錢儀吉致錢泰吉信，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鈔本。

生學。輯《賦選評註》，刊劉念臺《人譜》，又屬方伯張公刊《近思錄集註》，頒發書院。諸生遊其門者，如固始蔣湘南，商邱陳凝遠，密縣翟允之，洛陽曹肅孫，祥符徐錢齡，皆彬彬有以自見³⁹。

錢儀吉服膺朱子，在學海堂時就對留心詞章的學生，多特令讀《朱子大全集》，以培其本來，到大梁後也屢屢以此教導學生。在教授作文時，「不敢以揣摩時墨誤之，講文字只是命意有線索，遣詞須經典，而局勢句法，皆凡學文者不廢，不僅時墨也，而一切皆原本於命意，意必生於義理，則亦講義理而已，何他求焉」⁴⁰。

漢宋並重是錢儀吉一貫的學問之道，也是其教育實踐的準繩。他很早就對泰吉說過：

窮經以小學為本，漢人之小學，文字故訓也；宋人之小學，灑掃、應對、進退也。二者正宜兼習，不可偏廢。此即君子尊德性、道問學之大端。欲尊德性，則容貌詞氣必宜慎之又慎。觀曾子「所貴乎道者三」一節可見。若欲致力問學，則必先熟《爾雅》，而他經之詁訓，悉參其異同。佐以《說文》《廣韻》，則文字訓詁可以粗了。至治經，看一家之書，且守一家之說，不可以自己有意見。……讀史以制度典章為重。史家本有二派，治亂興衰一也，制度典章一也。顧興亡之跡，其理即具於經，考史以證經耳。至一朝因革損益，利弊之由，非講求有素，則徒善不足以為政⁴¹。

官場失意、南北飄零的經歷使他更願意向所謂先人遺澤、五百年家風中尋找寄託。他曾向泰吉詳論當世各家註疏長短，並提示治禮學之門徑：

竹村《儀禮》是家學，賈疏恠略增訂，不難也。詩疏最精，碩甫所以敢為之者，小學功夫深於《說文》，以之訂《毛詩》之訓，故差可耳，不必震乎其名也。《禮書》《通考詳節》皆可看者，然陳用之說經，不是從源頭上來，但取其一事見諸經者，薈萃一處耳。然又不如看《五禮通考》矣。凡講一事，甚費心力，至極繁瑣，而終至明白，則此工夫不為徒用。若東西綴輯新語，似乎無所不有，而實則一無所有。即《通考》所編各事，已不若本史中之源頭清澈。蓋皆有一時之風氣，一時之時勢，看了全局，雖難而易記。若更節之，則只可為策料而已。今說此，似乎大言，其實明一事，了一事。古來事勢大旨，亦非甚難明者。而經中之大疑義亦並不多，得一本以貫之，搃可通。如《說文》者，雖甚繁而至捷。

他對胡培翬的《儀禮正義》評價一般，認為陳奐《詩毛氏傳疏》之所以精緻，是因陳奐精通《說文》。這些評價並非對外公開，因此無所顧忌。但錢儀吉也承認這樣的治學法不太適應試，忙於考試的兒孫還是要先應付墨卷為要。他時常向泰吉分享大梁書院的講授經驗，比如教導蘇源生作文須考究每個字詞的意義、掌握識字校勘之

³⁹ 蘇源生《書先師錢星湖先生事》，《碑傳集補》卷十，葉 8b。

⁴⁰ 1840 年錢儀吉致錢泰吉信，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鈔本。

⁴¹ 《（錢泰吉）年譜》道光十三年條，葉 18b-19b。

法：

若我輩作文，用一字必求其來歷，即常言俗語，如字義可通，即俗亦雅。若字義不可通，即今人常用，亦不必學之。弟校書自自然常檢字書，亦可以得益也。孟子之辨事未能學，姑師韓子識字，何如。姪輩讀經，尤以識字為急⁴²。

道光二十年，寶惠、尊煌、寶宣同往北京參加順天鄉試，寶惠、寶宣中舉，回開封準備次年的會試，尤其是書法醜劣的寶宣須著重練字；落榜的尊煌則被錢儀吉安排回故鄉掃墓。但次年恩科，寶惠、寶宣俱報罷，暫回開封，「惟有努力讀書，勉求心得，庶幾他日有以自立」⁴³，之後俱往河北坐館謀生。當時大梁書院共有五十六名學生，錢儀吉為他們新添寫經功課，鈔寫《易》《書》《詩》《左傳》《周官》《儀禮》正文，並命之讀親自摘錄的《二程全書》《近思錄》《道一錄》《強學錄》等性理書。他將課程單和鈔經格式寄給泰吉，建議姪輩不妨也嘗試鈔經⁴⁴。這一年，他致泰吉信中頻繁論及與英軍交戰等時局，一方面是憂心國事，另一方面也因故鄉距海岸不遠，憂慮尤甚。更糟糕的是，這年夏天黃河決堤，大水圍開封城，大梁書院遭水，諸生逃散，錢儀吉一家也流離失所，不得不暫居朋友家，好在老幼平安。曾經以闔家團聚開封為喜，遭此則計劃回鄉安頓兒女為上，「不至如目前全局在此之可危」⁴⁵。他在信中請泰吉等故鄉親友尋覓可居住的房屋，但由於經濟困難和祖屋被佔等問題，始終難以落實。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英軍進攻乍浦，不久乍浦淪陷，死傷慘重。遠在開封的錢儀吉獲聞故鄉兵氛，不知詳情，十分焦急，在給泰吉信中對姪輩讀書有一番痛切的叮囑：

今則甚望諸姪治經之暇常看史鑒，漸能通達時勢，並窮達處世之方。此為至要。數十年來，非鈺釘之字書，即空疏之墨卷，人才汨沒，追恨無涯。而朱子之書，如《語類》《大全集》等一字不觀，尤為陷溺。其心之甚者，相與警前勉後者惟此。幸弟切諭之，並廣布之族戚間也。

面對家園失陷、內憂外患，錢儀吉認為背後的原因有數十年來讀書人沉迷考據或時藝，以致人才泯滅，希望姪輩研習正統經學之外也應熟知史事，並強調理學書對人才培養的意義。姑且不論他給出的解決方案是否可靠，但他已清楚意識到世變之重大，家族中年輕一輩必須有所應對。與此同時，新上任的河南巡撫鄂順安卻要求錢儀吉教大梁書院諸生試帖詩，令其選改刊刻，這正是儀吉一向厭惡的「空疏墨卷」，只好感慨「此亦無用之學，而在我則為職業，不可辭也」⁴⁶。

⁴² 1840年錢儀吉致錢泰吉信，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鈔本。

⁴³ 1841年四月十二日錢儀吉致錢泰吉信，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鈔本。

⁴⁴ 1841年錢儀吉致錢泰吉信，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鈔本。

⁴⁵ 1841年七月廿六日錢儀吉致錢泰吉信，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鈔本。

⁴⁶ 1842年七月十二日錢儀吉致錢泰吉信，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鈔本。

然而動蕩的局勢很快給錢儀吉帶來更直接的打擊。自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條約》簽訂後，清廷須償付巨額賠款，自然要清查戶部庫銀，隨後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清查結果是戶部庫銀虧短竟有 925 萬 2000 餘兩之多，「殊堪駭異」。道光皇帝下令，「自嘉慶五年至道光二十三年歷任庫官查庫御史各按在任年月，每月罰賠銀一千二百兩。已故者照數減半」⁴⁷。因十餘年前錢儀吉曾辦理稽查戶部銀庫事，此番也被追責，「罰金累鉅萬」。錢儀吉在嘉興既無房產，全家上下無一人在原籍，因此官府追查時首先要訊問儀吉姪孫，即儀吉大伯母年幼的嗣曾孫。遭此巨變，真如「以蚤負山，其勢必至齏粉，而且未有已也」⁴⁸。窮窘絕望中，錢儀吉四處求借，又遣寶惠遠赴桂林，向時任廣西巡撫的同年老友周之琦求助，此外只有依靠閱讀《近思錄集解》一書穩定心神⁴⁹。

一片慘淡中，赴試應舉仍是兒孫們不可耽誤的大事。道光二十四年，尊煌、柶孫二人北上應試，同年九月，捷報傳來，時年二十四歲的柶孫舉順天鄉試。錢儀吉幾乎不敢相信這樣的喜事，「傳觀名紙尚狐疑」，慶幸錢家「科名十二世於今」⁵⁰。轉年春，寶惠、柶孫（後更名錢柶）父子北上參加會試，俱報罷，仍回開封。此時錢儀吉似已下定了回故鄉的決心，遣寶惠夫婦先回嘉興，一面侍奉年逾九旬的大伯母，一面尋找全家居住的房屋。有人建議寶惠捐官，或有速選知縣之法。或許此時家中很難湊出一筆捐資，此事據錢儀吉稱並未實現⁵¹。但在錢應溥之子駿祥的硃卷中卻記錄寶惠是「國史館議敘候選知縣」，這應該是利用舉人資格報捐而來的候選資格⁵²。道光二十六年夏，錢儀吉四女叔琬病卒。僅五十四日之後，寶惠又病死故鄉。錢儀吉所受打擊可想而知，歸鄉卜居的理想從此再難實現。

錢柶服闕後，參加了道光三十年的會試，中式第一百八十二名。但未揭曉時的四月初七日，錢儀吉病卒開封，錢柶作為長孫，須丁承重憂，無法參加殿試⁵³。按清代制度，殿試前接到家報，需要丁憂守制者，不得應殿試，謂之「告殿」，凡告殿者准於下一、二科補殿試⁵⁴。直到咸豐六年，錢柶才參加殿試，列二甲第七十四名，交吏部以知縣簽分山西候補⁵⁵。清代中後期，除翰林院書常散館以知縣用者可以迅速得

⁴⁷ 《宣宗成皇帝實錄》卷三九一，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六日。

⁴⁸ 1843 年五月廿一日錢儀吉致錢泰吉信，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鈔本。

⁴⁹ 1843 年四月初十日錢儀吉致錢泰吉信，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鈔本。

⁵⁰ 錢儀吉〈柶孫舉京兆試志喜四律述懷中警並以示昆，甲辰秋九月〉，《衍石齋晚年詩稿》卷五，1932 年刊本，葉 5b-6a。

⁵¹ 錢儀吉〈哭大兒寶惠五百三十字〉句「有友為汝謀，勸汝速謁選。卓哉老成言，求仕勿為縣」，注「或為兒謀捐輸資，冀可速選。兒商于郡學教授未齋周君而止，周舊為天津令，有循良之譽」，《衍石齋晚年詩稿》卷五，葉 12a。

⁵² 《光緒乙酉科順天會試錢駿祥硃卷》，天津圖書館藏光緒間刻本，葉 3b。

⁵³ 錢儀吉編、錢駿祥續編《廬江錢氏年譜續編》卷五，遼寧省圖書館藏排印本，葉 58a。

⁵⁴ 張希清、毛佩琦、李世愉主編，李世愉、胡平著《中國科舉制度通史·清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頁 236。

⁵⁵ 《廬江錢氏年譜續編》卷五，葉 64b。《嘉興府志》卷四十七選舉四，葉 66a。

缺，一般進士可能等候較久。咸豐八年，錢枬充山西鄉試同考官。又四年，錢枬弟錢瑋奉母李介祉間關數千里至晉，就錢枬夏縣官舍。未幾，錢枬卒，沒有功名的錢瑋留在山西坐館，直到母親去世後才南歸。錢泰吉次子應溥為他謀館，穀於潤州道署⁵⁶。

此際錢家子孫離散各地，尊煌後來捐得候選刑部司務的官職，久客於汴，同治七年歿。元配程韻早已亡故，繼配沈氏與兒女回到吳門，受堂姪錢應溥贍養。僅知尊煌有一女嫁周之琦子汝策，此外均無從考察。而寶宣道光二十七年（1847）參加會試，得薦卷，揀發甘肅，補用知縣。天平天國亂後輾轉入蜀，同治八年入成都官書局，彝甫也投奔至成都，後為廣東試用通判，應該也是利用捐納獲得的資格⁵⁷。光緒元年，寶宣被聘為成都尊經書院主講，弟子中有學者廖平，此亦可視為清後期浙江學風遷移蜀中之一例。光緒五年，錢瑋卒於潤州。六年，彝甫重刊《衍石齋記事稿》《衍石齋記事續稿》各十卷，並《刻楮集》《旅逸小稿》。光緒十八年，錢儀吉三女仲愉卒。儀吉子孫輩數十年來「各以衣食奔走」，或早逝，或無功名顯赫者。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初七，跟隨伍廷芳出使外洋，剛從秘魯嘉里約正領事卸任的寶惠孫錢樹滋病歿於歸國輪船中⁵⁸。此後，錢儀吉遺稿逐漸星散市中，他生前傾盡心血搜羅整理的家族資料也未能順利刊版。

錢儀吉子孫中，錢枬應該是天份最高的一位，三十歲即通過會試，本有希望稍稍改善錢家景況，卻因丁憂守制錯過兩屆殿試。等到三十六歲獲允參加殿試，雖同榜有翁同龢等在晚清政壇極具影響力的學者，錢枬卻未能入選翰林院等清貴機構，而是遠赴山西「衝繁中缺」之地任知縣，從此與政治中樞絕緣，最終湮沒無聞。

四、錢泰吉的課子經驗與效果

作為對照，本章將視線轉向錢泰吉一家。由於父親錢復曾輾轉多地擔任中下級文官，錢泰吉四歲時就跟隨母親沈太恭人北上，來到保定，入私塾開蒙。當時泰吉長兄友泗尚在世，已就學北京。六歲時，泰吉隨專任升遷的父親來到吳橋縣，跟隨沈鳳輝讀書。十歲又隨父北上大興，先後從沈澍、徐景淳、吳蔭暄、沈方錢讀書。十五歲父親病卒，十六歲侍母扶父柩南歸，其時錢儀吉會試報罷，居於鄉里，泰吉每日就兄長論詩古文詞，郡人交稱曰「錢氏二石」。

嘉慶十三年，十八歲的泰吉服完父喪，參加縣學童試，以經義古學置第一入嘉興縣學。此後跟隨族孫錢爾琳（1766-1844）學習，屢次參加鄉試。從備考到赴省城應試，都需要莫大的開支，母親沈太恭人「食貧茹苦，節縮餐錢」，為泰吉準備舟船旅

⁵⁶ 《廬江錢氏年譜續編》卷六，葉 26ab。

⁵⁷ 《光緒乙酉科順天會試錢駿祥硃卷》，葉 4a。

⁵⁸ 「錢樹滋，浙江嘉興縣人，由難蔭知縣，捐分省補用同知，隨臣出洋，派充秘魯嘉里約正領事官，保衛商民甚為得力。旋以三年期滿，稟請銷差回華。竟因積勞觸瘴，歿於舟次。」〈伍廷芳片〉，《申報》1901年9月9日第12版「奏疏彙錄」。

費。每番發榜落第，總是安慰勉勵他，令其擴充學養，不要焦躁。嘉慶二十年，沈太恭人病故，泰吉守喪，服闕後繼續參加鄉試，仍報罷。接下來的道光元年秋試又繳羽，遂援例以訓導候選，即利用捐納制度以廩貢生身份獲得候選資格⁵⁹。由於等待銓選的時期無法確定，捐納只是獲得了一定的身份保障，若能在此期間順利中舉，自然是更好的結果，因此泰吉仍未放棄科舉，尤用力於舉業。錢儀吉曾在信中這樣安慰和建議：

弟秋試竟不入闈，毅力可佩。四百年著述，責在吾弟，勉之慎之。弟姪輩試作，略已評論，具大兄稟中。然科名正不必急急，所憂者，質墮於習，變化為難。失意可弔，得意亦可弔耳。言之喟然。兒輩近課荒廢，講書正苦無人，每日生書理書外，並無日程可錄者。聞銘恕姪文理漸通，宜因其質之所近，專守一書，日為講貫數百字，講法詳略淺深，亦須視其所到之地位，總以學生心開目明，乃為有益⁶⁰。

但道光五年，泰吉仍落第，時年三十五歲的他決定從此不再應試，專心治學。應付長期考試需要足夠的經濟能力，多次落選對人的心理也是巨大折磨，及時抽身未嘗不是一種理智的選擇，況且還有捐納的候選資格作為最低保障。清代不少知名學者的科舉之路都不太順利，比如名滿天下的戴震四十歲才中舉，六次參加會試均報罷；焦循三十九歲中舉，此後也沒有通過會試，遂絕意於科舉。道光七年，泰吉選授杭州府海寧州學訓導，開啟了清貧但相對穩定的生活。這類教職「向稱冷官」，因為「位卑祿薄」，好處是「事簡責輕」，遠離宦海風波⁶¹。泰吉偶讀仇遠「官冷身閒可讀書」之句，深有同感，遂以「可讀書齋」作為書齋名⁶²。此後，應試的寄託和壓力也全部轉移到兒輩身上。錢泰吉十九歲時娶同鄉監生胡斌之女，胡氏很長壽，育有兩子四女，泰吉晚年與側室還育有兩女。泰吉精通版本目錄之學，課子時尤其重視版本的選擇：

《周禮讀本》以德清袁氏櫪校刊本為善，正文句讀、音切頗清晰，便於童蒙。若欲觀鄭氏注、陸氏音義，則嘉善周氏福禮堂本為善⁶³。

不過泰吉對女兒的教育似不如儀吉重視，他提及女兒，只是感歎她們的純孝，如長女在他病後「叩頭祈禱，頭為之腫」⁶⁴；四女只是讀過《小學》《孟子》，「頗知禮法」而已，不見有詩名⁶⁵，不似儀吉諸女均擅長詩文書法。當然，儀吉諸女的基礎教育應歸功於陳爾士及儀吉側室姚靚的付出。與錢儀吉一樣，泰吉也為長子和次子定過課程單，他關於《劉巖山家塾規》的一則雜記可以略窺其課子宗旨，以及自己當

⁵⁹ 《甘泉鄉人稿》卷末附錢應溥撰《（錢泰吉）年譜》，同治十一年刊本，葉 8a-11b。

⁶⁰ 錢儀吉〈與四弟泰吉書第四首〉《衍石齋記事稿》卷二，葉 35b-36a。

⁶¹ 陸以湑《冷廬雜識》卷七「學官聯」，中華書局，1984年，頁 370。

⁶² 《（錢泰吉）年譜》，葉 15a。

⁶³ 錢泰吉〈周禮讀本〉，《曝書雜記》卷上，收入《甘泉鄉人稿》，同治十一年刊本，葉 10b。

⁶⁴ 錢泰吉〈自臨法帖及雜書跋〉，《甘泉鄉人稿》卷十一，葉 18a。

⁶⁵ 錢泰吉〈校陳后山集跋二則〉附錄，《甘泉鄉人稿》卷五，葉 16a。

年的應試之法：

十五志學之後，仿《讀書分年日程》治經之法而稍變通之，當鈔讀御纂、欽定諸經，而輔以古註疏。日課則以《叢山家塾規則》（附刻《人譜》後），蓋子弟不能不以舉業為正課。《叢山家塾規》以三六九為會課之期，午膳後搜講書所及之時藝數篇，擇其佳者閱之，蚤膳後溫書，申刻治古書一冊，燈下看《通鑒》五葉，朔望考一月課程之勤惰，以行賞罰。考畢學詩歌，歌畢閒評古今道理，互相質難。乃假若能如此用功，何患精力值不充，日力之不足，而過亦自此寡矣。以此應舉，庶幾無愧⁶⁶。

自康熙後期至乾隆年間，官方一直有意識地向各地書院及各級學校頒發御纂、欽定書籍，鼓勵民間書坊翻印銷售，以廣流傳⁶⁷。道光十五年夏，長子炳森（初名炳森，字子方，號景山，1816-1854）補嘉興縣學生，遠在廣州學海堂的錢儀吉獲知此訊，極感欣悅，在致泰吉信中說：

警石吾弟大喜。子方采芹，聞之大快。我安慶公支下文字之祥，二十年來久郁不發，得此風氣一開，若曹兄弟輩科名鵲起，而我兩人可以著書以老矣。大兄信中，知子方文筆甚好，非偶爾弋獲者。秋期在即，佇望鵬搏⁶⁸。

所謂「二十年來久郁不發」，是說錢汝恭子孫中，很長一段時間內無人中式。儀吉、泰吉兄弟的自我期許無外乎傳統讀書人的著書終老，但這一切都以兒輩順利通過科舉考試為前提。於是錢儀吉又在信中殷殷指點讀書之法：

《禮書綱目》似繁重，易窒文思。開卷《士冠禮》，即須看《儀禮註疏》，不若熟理《小戴記》，就陳氏《集說》，略講大意。有不可通者，翻翻註疏。然治經不如治史有益於文字，看《史記》不如《漢書》，看司馬公《通鑒》不如《記事本末》。此就現在讀書欲兼舉業者言之也。若果欲通經，非看註疏、看《說文》《爾雅》諸書不可，弟試酌之。

又稱寶惠「從前早看註疏、講《說文》，未免文心因茲窒滯。然是筆路本窒，否則博觀正可精取耳」，而寶惠困於場屋，主要因為運氣沒到⁶⁹。次年炳森參加鄉試，錢儀吉期待他「能即僥倖一中，豈非大快」，但事實並沒有這般理想。此後泰吉常將孩子們的文章寄給儀吉請教，儀吉曾在信中批評炳森「襲墨調」，「鄙意不以為然，宜令讀書，讀古文，讀天、崇、國初文為是」。然而炳森之所以會揣摩時文，也是因為久試不第。學問文章的出色並不意味著應試順利，炳森雖從小接受精英教育，勤於功課，擅長詩文，入縣學後先後受知於浙江學政李國杞、羅文俊，在學校考試中也獲高等，但鄉試仍屢屢受挫。錢儀吉一向擔心姪輩鑽研墨卷，敦促泰吉將他們「引入

⁶⁶ 《曝書雜記》卷中，葉 23b-24a。

⁶⁷ 曹南屏〈清代科舉的知識規劃、考試實踐與士子群體的知識養成〉，頁 147。

⁶⁸ 1835 年六月十七日錢儀吉致錢泰吉信，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鈔本。

⁶⁹ 1835 年九月九日錢儀吉致錢泰吉信，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鈔本。

讀書正路」，「書理必須講求，世事必須通曉」⁷⁰。

道光十九年，泰吉次子、比炳森小八歲的應溥（1824-1902）順利進入縣學，錢儀吉甚為喜悅，認為這是泰吉「苦心教習，漸有大效」。聽說應溥尚未聯姻，也給出意見：

幸勿聯姻富室，搃以慈善人家閨秀耐勤苦而有卷軸氣者，乃為上耳。論人才曰賢曰能，往往不得兼也。如子以賢為貴，亦無取能耳耳。

並認為自己為兒子們聘婦都是「無意中所定，差免大謬」⁷¹。錢儀吉的四位兒婦中，長媳與四媳來自親眷聯姻，次媳、三媳是他京官時代好友之女，都是書卷氣濃郁的閨秀。數年後，應溥娶海寧許嘉猷孫女。許嘉猷官沛縣知縣，受教於錢豫章，與錢復、錢福胙為摯友，曾被錢開仕聘為館師，與儀吉亦有舊交，解任後借寓嘉興城內。泰吉初至海昌，就曾請謁，贈送家族文集多部⁷²。許氏雖出身詩禮之家，幼時卻未接受教育，婚後才跟隨丈夫認字，漸知文義。不過她敦厚純孝，這一點很合乎錢儀吉的標準⁷³。泰吉此際向儀吉為應溥求字，儀吉認為「溥之意為廣大，字之自應收斂向里，乃合古義」，遂取朱熹詩「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取字「子密」。應溥在學校成績優異，很受學政羅文俊賞識⁷⁴。

對於兒輩屢試不第的困境，錢儀吉對泰吉多有寬慰，也是自明心志：

吾與弟皆不幸早歲失怙，承訓之日無幾，今亦惟賴讀先世遺書，想見萬一，勉力盡心，教子姪以讀書循理。心地中有一片藹然仁厚意思生出，即可為自家一生立命處，保家室，有子孫，亦必原本於此。科第仕官，未得思之徒勞，既得副之亦不易，非敢薄之也，而實不足為輕重。秀才背考籃，但素位而行可耳。不必以此擾擾胸次，妨我讀書之樂也。後生小子，亦何能及此。然不可不存此意，徐俟有得，則至樂存焉。

困頓窮窘之中，先人遺著是重要的心理支撐，可以強化錢氏子孫的身份認同，抵達理想的讀書境界。當時正值儀吉諸子參加順天鄉試之時，結果未知，前途難卜，只有自我慰解說不應以科舉成敗擾亂內心，妨礙真正的讀書之樂。應試與讀書之間的矛盾深刻困擾著他們，錢儀吉也只有反覆以先人嘉言善行勸之導之，並令泰吉告之兒輩謹記心中，勿為流俗所擾；又敦促子姪輩「倍尊敦實庸行，講求義理之學。《中庸》一編，必須徹上徹下，用力一番」⁷⁵。

泰吉將儀吉這番教導細細與兒輩講說，並鈔一通寄給同族姪輩，令其傳誦講解，

⁷⁰ 1844年錢儀吉致錢泰吉信，《錢儀吉日記書札輯存》（外二種），頁161。

⁷¹ 1839年錢儀吉致錢泰吉信，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鈔本。

⁷² 錢泰吉〈讀許同先生遺稿雜識三則〉，《甘泉鄉人稿》卷十三，葉5a。許嘉猷編《許順庵老人自述年譜》，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道光間刻本，葉34a。

⁷³ 《廬江錢氏年譜續編》卷五，葉65a-66b。

⁷⁴ 《廬江錢氏年譜續編》卷五，葉44b。

⁷⁵ 1844年1月17日錢儀吉致錢泰吉信，《錢儀吉日記書信輯存》（外二種），頁160。

但也坦言對於忙著應試的兒輩來說，講求義理、追求真正的學問實在太難：

弟已無科舉之累，亦尚未能潛心義理，總由文字之障未除也。舉業代聖賢立言，果能實力奉行，較他文字尤易近道。兒輩究是根本未立，所以理路不清，專咎墨卷，墨卷豈任咎哉。現且令理經，能熟讀正文後，各就性之所近，稍立牆壁，不失為讀書種子，足矣。科舉得失，弟已淡焉。置之不敢奢望。喫有菜飯，著可補衣，為童子師，先人餘澤，或未歇絕也⁷⁶。

道光二十四年秋，炳森考中浙江省鄉試第五十四名。錢枬亦中這一屆鄉試，錢儀吉在開封晝夜探問故鄉姪輩有無上榜的消息，但一無所知。待看到浙江鄉試題名錄，只見錢氏僅炳森一人，卻不知就是泰吉之子——此前炳森一直用舊名「銘恕」，因而十分煩悶，以致於齒痛大作⁷⁷。又過兩日，接到大伯母金孝維寄自故鄉的書信，才知道炳森就是銘恕，此名是請人新改，頓時狂喜不禁，「叔姪同科，固為佳話，尤妙在我兩人之子孫」⁷⁸。科舉時代的人們有很多迷信，比如久試不第者有時會請人排八字、重新起名或字。儀吉難免受此影響，想到久試不第的長子，感慨過大姪炳森字「子方」比寶惠字「子萬（萬）」更出一頭，而尊煌、寶宣也都改過名字。炳森轉年參加會試報罷，泰吉寬慰兒輩「仕宦科第不足為榮」，最重要的還是「守遺澤，讀舊書」，「無負先人之訓」⁷⁹。他在給儀吉的信中也談到這種心境：

吾家文字，又值發祥之時，此後仕學，各立本根，各成局面，則在諸子弟之善讀先世遺書，善守先人家法矣。吾兄及弟，廩廩數十年，幸見子孫次第掇取科名，兄之所成就者，可以息肩矣。弟則尚茫然不自知其何以為子弟法也。如何如何。二十年來，父子燈下講論誦讀之日，卻亦不少。兒曹功名若遂，則此樂渺不可得矣⁸⁰。

在沒有得到功名之前，徹底放棄並不容易，畢竟也有人終身應考，比如錢儀吉從子繼善「篤志舉業，暮年猶赴省試不輟」⁸¹；在激烈的競爭與反復的失敗之下，又只能以謙退自守加以開解。不過泰吉對兒輩的教導很快將有矚目的成效，道光二十九年，二十六歲的應溥充選拔貢生，次年與錢枬同中式會試，並順利參加覆試、殿試、朝考，覆試一等第一名，朝考二等第二十五名，欽點七品小京官，分吏部文選司學習⁸²。比應溥大三歲的錢枬因服喪錯過了這次殿試選官的機會，從此踏上與應溥差距懸殊的人生之旅。同年，一直沒有考中進士的炳森在又一次的會試失敗後充國史館膳錄，後考取景山官學教習。景山官學是專為旗人子弟設立的學校，原本以新進士老成者充漢教習；雍正後，漢教習以舉人、貢生考取，三年期滿，咨部敘用，是收容會

⁷⁶ 錢泰吉《甘泉鄉人稿》卷二，葉20ab。

⁷⁷ 1844年11月25日錢儀吉致錢泰吉信，《錢儀吉日記書信輯存》（外二種），頁167。

⁷⁸ 1845年1月3日錢儀吉致錢泰吉信，《錢儀吉日記書札輯存》（外二種），頁171。

⁷⁹ 錢應溥〈先兄子方行略〉，葉3a。

⁸⁰ 1845年九月初錢泰吉致錢儀吉信，《甘泉鄉人稿》卷二，葉22ab。

⁸¹ 《廬江錢氏年譜續編》卷六，葉16b。

⁸² 《道光三十年庚戌科拔貢朝考同年齒錄》第二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道光間韞寶齋刊本。

試落第舉人的過渡身份，錢福昨曾考取的咸安宮教習也屬於同樣性質⁸³。但炳森在咸豐四年病卒，留有六子二女，均由應溥照拂成人。

此後應溥入軍機處，錢泰吉也因此得誥封。咸豐十年，太平軍陷浙江，泰吉避至深鄉，轉年應溥歸鄉，又與父親乘船經海路逃亡至上海，換小船抵九江。已入暮年的錢泰吉流離失所，「晚年遭寇亂，扁舟落江淮」⁸⁴，固極慘淡；但僥倖生存，又算萬幸，因為錢家親眷中有不少死於戰亂的無辜老幼。同治元年，錢應溥受曾國藩之招，奉父母至安慶，次年錢泰吉病卒，曾國藩撰墓表，尤其稱賞錢儀吉、泰吉兄弟「宗主義理，不薄考據」的調和漢宋之旨⁸⁵。

應溥後來回到中樞，官至工部尚書，任方略館總裁，子姪均有成就。錢泰吉摯友沈濂曾回憶泰吉親自主鈔《詩經》課兒的風景，說他注重選擇善本，而應溥在科舉和官場的成就則成為這段往事最有說服力的註腳：

世人課學僮，不求善本儲。麻沙謬相授，往往淆魯魚。錢子昔閉關，課兒就塾初。手寫三百篇，大字光琳珎。音聲及點畫，辨析窮錙銖。冠以子夏序，義兼毛鄭朱。驥子兩丸髻，摳衣趨座隅。琅琅聲續續，翻瓶瀉水如。余時常在旁，靜聽神為愉。倏忽三十載，邦國交令譽。觥觥國子師，上舍經苗畬。父書謹藏弄，出入必與俱。通神化首卷，惆悵心盤紆。疾書補其闕，不敢煩鈔胥。惟選續談史，惟固成彪書。專門守舊德，事異心不殊。雕版古未有，點漆以書觚。想見宣尼筆，授經于庭趨。術業箕裘行，規模堂構扶。孰云遺子孫，贏金欲有餘⁸⁶。

五、結語

以上透過錢儀吉、泰吉兩家課子實踐的個案分析，探討了家庭教育和科舉成就的關聯。

錢儀吉、泰吉自幼跟隨在外任官的父親輾轉南北，也都經歷了父親的早逝。他們繼承家學，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顯露出過人的才華，但二人的科舉結果卻全然不同。很早考中進士的錢儀吉在教育兒輩時傾向學者式的精英教育，注重經史小學，對時文墨卷頗為厭惡，但他自己應試的成功經驗卻很難在兒輩身上複製。他在歷史地理方面的專長與興趣使他可以勝任會典館總纂的任務，但他任官戶部時卻在覈查假照、稽查銀庫等實務性工作上屢出紕漏，也導致他日後遭罷官乃至離職十數年仍被追繳庫銀的命運。這當然不是錢儀吉一人的問題，這些清貴的高級文官基本不具備實務能力，具體工作都交給胥吏處理，自己則專注交遊著述；對龐大官僚機構的漏洞與積弊渾然不

⁸³ 《清史稿》卷一百六，志八十一，選舉一，學校一，中華書局，1977年，頁3113。

⁸⁴ 翁同龢〈題錢警石先生《冷齋勘書圖》〉，謝俊美編《翁同龢集》，中華書局，2021年，頁1093。

⁸⁵ 曾國藩〈海寧州訓導錢君墓表〉，《甘泉鄉人稿》卷首。

⁸⁶ 沈濂〈題警石手鈔詩經〉，《蓮溪吟稿》卷八，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咸豐四年刊本，葉九ab。

察，或即便有所覺察也無所措置，直到系統出現更嚴重的問題而勉強彌縫。很難假設，如果錢儀吉沒有被罷官，兒孫們的科舉之路是否會稍稍順利；但可以推測，倘若如此，錢儀吉的經濟狀況可能稍有改善，久試不第的兒孫應該會在更早的時候有機會利用捐納等方式尋出路。

錢泰吉在科舉之路上連鄉試環節都沒有突破，但幸有教席棲身，近與故鄉親族及在地學者交流，遠與兄長時時書問請教，事實上擁有很好的研究環境，因而精於校勘，著述豐富。這種相對安定的環境和他深厚的學養乃至應考方面的失敗經驗，都是兒輩應對考試的重要資源。應當注意的是，雖然日後應溥仕途順暢，但當中有很大的運氣因素，個人資質和家庭教育都不能保證這一結果。錢儀吉去世前後，兒孫中有二人中舉，一人通過會試，比泰吉兒輩情況稍好。但中舉的寶惠早亡，通過會試的錢侶因丁承重憂等待六年方允殿試，可見通過考試只是科舉之路上種種考驗的一環而已。

再看錢儀吉、泰吉兩家的聯姻情況。錢儀吉有一位家庭富裕且受過教育的妻子，為兒女選擇婚姻時，長子、幼子和三女與親族聯姻，次子、三子、次女、幼女與官員子女聯姻，他們都是浙江人，或祖籍浙江。錢泰吉的妻子是監生之女，由於他社會地位不顯，兒女們也多與親眷或沒有正途功名的人結親。而待應溥進入中央，續娶的就是安徽巡撫程霖采之女。但聯姻對維繫家庭地位的幫助並不明顯，同樣進士出身的兩個家庭為兒女聯姻，若兒輩無法用正途或異途獲得功名，仍難免困境；而考試的壓力將傳遞到下一代身上，重複漫長的備考、等待與失敗，以及可能突然降臨的、概率很低的成功。

何炳棣揭示，明清中國，人口的倍增與技術的停滯，使社會長期的向下流動趨勢無法避免。本文所舉的兩個個案中，從位極人臣的錢陳群而下，眾多子孫所經歷的無疑是「向下流動」，到錢儀吉、泰吉這一輩已祖產無多，經濟窘迫。錢儀吉的身份地位因科舉成功而有所上升，但至兒輩又繼續向下。錢儀吉雖已清楚認識到盲目應試對涵養學問、培養人才沒有什麼用處，讀書人應對時事有更清楚的認識，但他的思維很難脫離傳統社會知識精英的框架與立場，對兒輩的期望仍是積極參與考試。錢泰吉次子應溥科舉順利、在太平天國之亂中受兩江總督曾國藩之召出任幕僚，積累了日後回歸中樞的重要政治資源；錢泰吉也因次子獲得誥封，昔日身在縣學時情人所作〈冷官勘書圖〉，在他身後經應溥之手又得諸多名流題跋，甚至不乏「君家聞望兩浙高，尚書風采傾群僚」之類的諛詞⁸⁷。錢儀吉當初從京中短暫歸鄉，與泰吉相約「願買田一雙，耦耕傍先隴」的夢想，在兒輩身上也沒有實現。被科舉選拔制度捆綁的人生固已不自由，清代後期迭起的內外戰亂更使傳統知識精英的耕讀之夢無從實現。錢應溥晚年遇庚子事變，寓所鄰近使館，槍彈橫飛，大受驚擾。他在衰病中南歸，在憂憤歎息

⁸⁷ 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同治六年五月初七日，樊昕整理《趙烈文日記》，中華書局，2020年，頁1458。

中死去⁸⁸。這已是科舉廢除的前夜，此後精英學者家庭教育的模式及讀書傳統也將發生深刻的變化。

⁸⁸ 朱福詵〈誥授光祿大夫賞戴花翎頭品頂戴軍機大臣工部尚書方略館總裁嘉興錢公墓志銘〉，閔爾昌錄《碑傳集補》卷四，葉 6b，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100 輯，文海出版社，1973 年，頁 285。